

## 90 年代日本在上海浦东投资 趋势研究

[美] 瓦尔特·阿蒙德 著      薛晓源 编译

### 引 言

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最根本的变化之一。随着欧洲、美洲以及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这三大贸易地区的形成，了解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上海及浦东新区为背景，阐明 90 年代初日本投资的环境因素。

本文的基本前提是中日两国都承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但双方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政治目标。中国主要以新重商主义为导向，而日本则在双方这种重要的关系在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之间权衡利弊。

本文首先要分析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动因，并讨论促使中国向日本招商引资的各种因素。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阐释日本想通过在上海浦东新区投资达到什么目的，中国为什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力地争取日本的投资以及它是如何争取日本投资

的。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日本公司一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商品贸易，对投资保持克制，然后他们就一直等待直到 1988 年成功签订了中日投资保护协定，获得了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在经过一段时期创纪录的国外投资之后，中国并没有在经济特区就技术转让、股权投资和出口收益方面获得它所希望的结果。由于中国政府需要来自外国公司的股权合资机会，因此对其与外商投资的谈判地位作出了部分让步。尤其是，中国与众多的日本公司进行了单独谈判，并且开始允许建立日本全资企业，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

## 理论思考

本文虽然在其实质上主要以描述和阐释为主，不是一篇理论性的论文，但是它并非完全不注意理论思考。

自从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兴衰变迁激发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这些研究除了想说明中日关系中的心理和认知层面，还想阐明这一关系的经济、战略和安全方面。这里对我们讨论的主题最有用的是克莱因伯格 (Kleinberg) 的论断，即：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主要遵循新重商主义模式。他认为，1978 年以后，中国领导人向外界打开了国门，通过获取国外的技术、资金、资助、优惠贷款和国外的直接投资，以及扩大出口，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国家利益。同样有趣和有用的是皮尔逊 (Pearson) 对广为人们支持的论点的挑战。这种论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谈判、规范和监督，

使他们比非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控制外国投资。而皮尔逊认为，中国巨大市场的诱惑提高了中国的谈判地位，但是她指出，官方管理外国资本的努力常常因为国内外的压力而实施不力，受到削弱。

## 动机形成的基础

首先，我们将集中讨论促使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因素，同时，我们还将阐述促使中国向日本投资投标的相关因素。

日本多数分析家一致认为，自 70 年代以来，日本到中国投资的基本动因是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的吸引。日本行动的强大动力主要是要阻止其他竞争者首先进入并占领中国市场。1972 年日本迅速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很重要的动力是它希望先于美国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1978 年的长期贸易协定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为日本工商界的中国热提供了新的动力。可是，在经历了宝山钢铁厂合同取消的痛苦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即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逐渐为更现实的评判所代替。此后，日本企业以更理智的态度指导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但是，尽管有许多官僚的、政治的、后勤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日本仍然在中国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地位。比如，1988 年，日本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中国提供了 80% 的贷款和 9% 的国外投资。到 80 年代中期，多数日本公司主要与中国进行贸易来往，与日本在其他地区的方式相同，日本对直接投资兴趣不大。许多日本公司是被迅速的收益吸引到中国的，在 1983 到 1986 年繁荣时期，数不清的中小企业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不足，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中国不景气的商业和经济条件的负面宣传和报道。此外，直到 80 年代中期日本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到国外包括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他们担心当时还显得很突出的“负面效果”。他们推想，技术、生产技术和技能的管理技能的转让会对日本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因为这会促进未来对手的成长从而引起产品回流。这种推理思路首先针对南韩和台湾，中国也不例外。日本不愿意组建合资企业，不愿意去国外直接投资。这种情形在 80 年代开始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日元走强使日本出口价格增长。由于低廉的制造费用，越来越多的日本制造商开始开拓国外市场，其中也包括中国。

也许还有一个相关因素更为重要，这就是日本工商界认为中国的法制不够健全，不足以保护外国投资，因此坚持要有更好的保护贸易制度。经过漫长的谈判后，中国终于同意。1988 年 8 月，中日双方签定了中日投资保护协定，这肯定被视为中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日本投资所做出的重大让步。这个协定自 1981 年开始经过了 9 轮谈判，得到日本工商业团体的欢迎，保证给予对方“国民待遇”。日本首相竹下登称颂日中投资保护协定对中日经济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合约推进了日本合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一般说来，由于日中经济关系主要是私营部门活动的结果，所以日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和投资也是共同倡议、自行决定的结果。日本对中国政策的倡议大都很敏感，长期以来一直很重视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层面，同时日本对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层面却始终缺乏诚意。不过，日本领导层似乎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稳定符合亚太地区 and 日本的利益。中国作为日本的贸易与海

外发展援助的接受者，与日本经济圈联系非常密切。日本对中国要求捐助和贷款也总是表示回应。通过这些经济联系，日本试图提高中国的稳定性，以保护它自身的经济安全。日本在 90 年代初有意加强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其原因也可用日本在全球范围进行系统的贸易扩张和投资来解释。日本在全球的贸易扩张和投资是为即将来临的全球竞争做准备，从而遏制欧洲和北美反对日本。但是，日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以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为敌，通过把中国并入以日本为主的东亚工业秩序来规划它过多的财政和技术力量。然而，要形成日本领导的东亚经济集团是完全不可能的。

### 日本投资在浦东规划中的作用

90 年代以前 改革派认为 国外的直接投资 尤其是合资企业，能给中国提供中国自身经济所缺乏的四样东西，即新的资金来源、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技能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的目的和责任就是要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赚取外汇、从事出口生产并吸收国外的技术。

经济特区成立后 经过几年时间 开始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后果即使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不是有害的，至少也是与之相矛盾的。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特区对国家经济作出的确切贡献很难估测。第二，建立经济特区所花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从一开始就十分令人费解。第三，经济特区没能成功地吸引中国可以学到的国外高技术的制造加工业技术。第四，经济特区的各项活动没有充分地面向出口。总而言之，到 80 年代末，有充分的迹象表明 经济特区没有

像原来计划中的那样引导出现代的外向型工业的发展。

90 年代的改革举措标志着对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放任自流的方式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经济特区似乎享受着充满改革思想的中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但是 由于经济特区明显的缺陷 即缺乏实用效益和经济效益，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中引起不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90 年代初除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外 中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经济实力的对抗中心。开发上海浦东地区的想法似乎有望平衡中国南方的经济力量和对外贸易的优势。浦东发展规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启动了上海浦东地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规划代表了中国新的发展蓝图；在保证“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 该规划也建议中央实施更深入的计划与调控。

浦东规划主要强调发展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上海浦东地区将成为一个新的贸易、金融、运输和高科技中心 这与其他主要是加工区的经济特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上海浦东规划的设计者以及中国的领导者希望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衍生出重要的经济范例和多重效益。

显然 国外投资、技术转让、贸易和扩大出口代表了浦东发展规划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此，日本的参与和潜在的贡献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日本在中国的丰富经验、地理的相邻性、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充足的财源都使日本成为参与浦东事业的理想人选。无疑，日本可以给中国的工厂和企业提供资金和各种技术援助，从而促成浦东发展规划所希望的高技术工业。有充分的迹象表明 中国现任领导人正是这样看待日本的 认为

要使浦东规划切实可行,日本的投资、技术转让和经济帮助不但重要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最后,日本在浦东规划中的承诺、参与和合作,其性质对于中国领导中一些浦东的主要支持者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浦东规划中日本的潜在作用,首先必须说明 1978 年以来日本投资的总趋势和发展。

### 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发展

从 1978 年到 1989 年,各种形式的国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增长速度引人注目。1985 年,可确保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达 150 亿美元,到 1988 年底达到 270 亿美元。从 1979 年到 1989 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计有 26 亿美元可确保,19 亿美元未完成。到 1988 年,来自日本的企业投资在制造业有 3.49 亿美元,资源开发有 4900 万美元,商业和服务业有 15.75 亿美元,其他行业有 6400 万美元。

日本公司喜欢以全资的形式投资于服务业和与贸易相关的风险事业,而中国政府在各种投资形式中更喜欢股份制合资企业(EJV)。中国政府偏爱 EJV 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EJV 能使外资方更多地承诺项目的成功。第二,外国的合作者作为主动的投资股东,能传输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使企业获得最有效率的成功。第三,EJV 使得政府能更直接地控制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活动。根据皮尔逊的分析,在 1979—1988 年期间,香港和澳门占有合资企业的所有外国资金的 65%,美国占 11%,日本占 9%。与日本占贸易和贷款的主导地位相比,日本投资者对合资企业形式所要求的长期在中国投资更为小心翼翼。尽管中国官方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日本公司仍然是保守的投资

者。

1985—1986 年期间 日本在全球的直接投资开始剧增 中国原本希望能获得其中的大部分投资 中国人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国迅速增长的工资 伴随着日元和台币的升值 将促使日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可是，日本企业把他们的境外生产搬到了东南亚 因为那里能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优厚条件 具有比中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令日本企业深感忧虑的是中国不稳定的投资环境，尤其是中国的法制、外汇问题、出口条件、不充分的基础设施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原料和能源问题所带来的日趋恶化的经济条件。此外 日本企业通常不愿像中国一样热心于股份制合资企业 尤其是那些需要非常精密复杂的制造工序、要求标准的制造线而不是地方参与的合资企业。

但是，1988 年中日投资保护协议签订后，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开始迅速增加，其未来的前景似乎是大有希望。但是 80 年代末，中国经济日益加剧的困难突然打断了这些原本兴盛的开端。在 1980—1990 年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仅占其全球投资的 0.6%，亚洲地区投资的 5.3%。

## 90 年代初的日本投资

到 1989 年仲夏，由于始于 1988 年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所有与外国投资有关的活动都减少并近乎停止。日本在中国投资的复苏直到 1990 年初才真正开始。到 1990 年仲夏 日本投资活动开始振兴起来 许多暂停了的工程项目逐渐恢复。

要说明日本在中国投资活动的复兴，首先必须提到的是 1990 年在休斯顿召开的发达工业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宣布重新开始日本的“第三次日元贷款”。显然，这一宣告为日本在中国的工商业界提供了官方的通行证，标志着日本投资浪潮的开始，自此，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大。

其次，至关重要的是说明日本投资为什么会在 1990 年仲夏迅速扩大。特别是考虑到在 1978—1989 年‘改革者’实现现代化的 10 年间，日本对在中国投资小心翼翼，很不情愿。也许促使日本厂商把中国当作他们海外的投资场所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政府于 1988 年开始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改进中国投资环境。最令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公司安慰的是，90 年代初为争取新投资的一部分，中国制定了一套新的保护现存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和法规。

比如，1990 年 4 月，中国对 1988 年以来一直悬置一旁的合资法做了多处修正。最有意义的是那些具有创新的条款，如明确保证合资企业的私有性质（保证不国有化）；允许外籍人士担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在总体上取消了针对合资企业的限制性条件。日本工商界非常欢迎这些变化，现在，中日双方似乎都有同样的感觉，即日本扩大在中国投资的重要前提条件终于得到了满足。于是，这就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于 1990 年 4 月公布浦东发展规划成为可能。在此规划中，日本作为投资、资源、技术和援助的提供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讨论日本在上海的新的存在及其在浦东开发的作用之前，有必要讨论成立浦东新区的重要意义，描述它的构想和成立过程。

## 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

### 从停滞不前到经济复兴

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广东一直走在上海和中国的前面。上海曾经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打击以及“四人帮”灭亡后留下的政治裂缝，上海一直处在沉闷之中。到 80 年代初期，上海的工业增长率不及全国平均增长率的一半。总而言之，上海是日本企业想回避的地区，之所以要回避，主要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官僚、最令人沮丧的城市”。日本投资者喜欢中国南部的经济特区、山东省和东北地区。大约从 1978 年开始，上海就停滞不前，其财政收入减少、工业效率下降、基础建设退化，缺乏独立的贸易能力。

从 1950 年到 1980 年，上海的对外贸易量大约是全国外贸总量的 1/3。但是，1978 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使许多内地城市开始直接生产与出口。由于转口贸易急剧下降，加工所需的原材料的保证供应也急剧减少，上海作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和制造中心，受到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传统上，上海一直享受低价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同时，上海的工业产品却卖得很贵，并且在内地占有垄断市场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自 50 年代以来，上海的工业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四大支柱产业是纺织、金属、机械和化工。但是，随着 70 年代末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体制改革，上海的经济体制就显现出其固有的弱点，无法实施其预期功能。因此，对上海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想减少上海对低附加值产品和商品的依赖，抑制上海的衰落，就必须更新其经济结构，把城市工业结构

从生产低档产品的加工业提升为增值更高的工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政治上讲，上海在 80 年代初还没有能力对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实行如此激烈的改革和变动。上海依然困扰在政治往事中，许多人抱怨说，上海因为与“四人帮”有牵连而受到不合理的处罚。同时，上海官员批评并抱怨给予中国南方经济特区的优惠待遇，认为那是浪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1983 年夏，以专家治国论者为主导的新的市领导班子的形成，才使上海出现了决定性的好转，新领导班子的任命促使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旨在振兴上海潜在的经济和工业能力。

有更加精明和面向发展的领导人在其领导岗位，上海立即坚定不移地开始着力纠正它的经济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83 年 6 月，上海首次举行了对外贸易交易会，以促进其出口型产品。为了推动上海的涉外商务，成立了对外贸易委员会，同时，出台了吸引特别投资的各种计划。1984 年，国务院指定上海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这一举措使上海具有更强的能力吸引外国投资。1986 年 10 月，上海宣布了一系列新法规，公正地界定了“出口型”和“技术型”企业在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给予指定的企业实质性的优惠，并予以他们获取原材料、公用服务、设备和贷款的优先权。

1987 年 4 月，美籍华人学者林同炎应中央有关领导的邀请，去北京商讨浦东发展规划的可能性。林同炎在 1985 年研究和评估过浦东地区的发展潜力。接着，发展浦东地区国际研讨会于 1988 年 5 月 2 日至 4 日在上海举行。紧接着，上海新市长朱镕基保证减去各种繁文缛节以便吸引 100 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为浦东开发提供资金。到 1988 年，上海似乎在经济复兴和

改革的路上一帆风顺，历经十多年的相对滞后，上海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浦东新区的成立

在宣布成立浦东新区之前，相继进行了多起高层的政治活动。1990年初据说邓小平对开发浦东地区显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说他相信中国认真考虑浦东规划还为时不晚。邓小平指示国务院继续进行浦东发展规划。1990年3月28日到4月8日，副总理姚依林带着收集大量事实的使命来到浦东。接着，姚指出，开放浦东也就等于开放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浦东将成为开发区的黄金宝地。几天后，即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视察时宣布，中央政府已经批准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中国将利用她过去10年积累的经济特区的经验开发浦东。李鹏还着重强调了浦东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以浦东发展规划为基础 预计用25年的时间完成浦东的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成为90年代初成立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浦东也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它当时占地350平方公里，比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加起来的面积还大。指定的那个地方是与上海市毗邻的一块三角形的地区，东及黄浦江，往西南延伸至长江入海口。该区的大部分地方都在离上海市中心15公里范围内。浦东有110万人口，1930个工业性企业雇用了大约38万员工。

从功能上讲 浦东新区被设定为外国投资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与深圳不同，浦东有中国最强大的工业、科学和技术力量作支撑，而前者当初只是一个小渔村。外国投资者能在这里享受到给予其他经济特区的同样的待遇，而且外国银行首次得到允许在这里开设分行。最后，上海正在为浦东新区草拟一个

新的土地租用政策，这一政策有望比中国其他的土地租用惯例更加灵活。

目前，德国、香港、日本、美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浦东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投资者，他们一直致力于引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1990 年，有 55 家外国提供资金的合资企业（中国喜欢的类型）总共投资了 2.64 亿美元。不过，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外国全资企业的迅速增加，仅 1990 年就有 42 家全资企业得到批准，吸引投资资金约 2.88 亿美元。

## 日本与上海浦东发展规划

下面我们将描述 1990 年以来，由于中国努力争取日本投资和参与浦东开发项目，日本在上海的经济势力与日俱增。此外，我们还试图阐明中国吸引日本投资的种种具有诱惑力的优惠条件如何加深了上海与日本工业经济的相互依赖。

吸引外国到上海和浦东投资是上海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比如，今年年初，上海前任市长朱镕基为了吸引欧洲的投资，访问了好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他在欧洲的讲话中，不仅解释了浦东发展规划的经济和工业活动范围，而且着重强调了专门为浦东事业制定的特殊政策的重要性。

上海市政府为吸引日本对浦东事业的兴趣作出了特殊的努力。1990 年 10 月，上海市长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大阪和东京向日本商业界人士简要介绍了浦东的发展和日本投资者在浦东新区的商业机会。上海还计划在东京举办出口产品展览会，展示上海制造商和研究机构的 400 多种新技术产品。同时，推动浦东事业的研讨会也在筹划之中。显而易见，即将举办的展览

会是想向更多的日本观众展示上海的科技能力（和潜力）。

自从浦东开发规划宣布后，日本许多对浦东感兴趣的专家代表团和访问团来到上海和浦东调查实情。在此试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证：1990年11月，日本的规划、建筑和法律专家访问上海，参加一个开发浦东新区的研讨会，提出了许多有关浦东建筑、基础设施和土地权转让的建议。与此同时，中日保险专家在1990年10月汇聚上海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来自东京海险与火险保险公司的专家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听众就保险业的各方面问题作了报告。日本联邦银行协会的代表团访问上海，评估浦东开发规划提出的将浦东建成金融中心的可能性。日本被希望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起到主要的作用。1990年12月，关西·大阪地区的一群访问上海的生意人愿意在浦东经济区成立一个工业专区。

到90年代中期，日本资金已经开始涌入上海而不是流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者是80年代日本企业的主要投资去处。投入上海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基础工业，这与几年前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日本大多投资于食品加工、轻工业和纺织业。1990年10月，日本大和银行与两家中国银行和一家香港银行共同签订了一份合同，旨在浦东新区成立一家合资的金融公司。上述的这些发展使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在1991年预测，“1991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他说，日本公司‘在1990年观望政策后’准备‘采取行动’”。

1991年1月，上海中日贸易中心，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建筑，经过长时期的酝酿，正式开业。这家合资企业可以看作是上海中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日双方最费力的学习经历。这家合资企业的一方是日本 KOWA 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日本工业

银行，中方合作伙伴是上海对外贸易公司和上海国际贸易展览公司。

1991 年 4 月，由日本工商业界经理组成的正式代表团首次 在 90 年代初访问中国。该代表团是由中日投资和发展协会组织的，这个协会是由日本中小企业领导创立的一个非官方机构，目的是要推进日本在中国的投资。

1991 年 6 月 两家日本 商业 投资促进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联合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 90 年代中国的发展规划与上海浦东新区的投资机遇。会后，该组织的日本成员被新任上海市市长黄菊请到浦东一游。中日投资促进委员会和日中投资促进委员会都成立于 1990 年，其会员包括大型工商企业的人士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这两家组织承诺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并通过各种研讨会，向会员解释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其目的是要说服那些不愿意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

从 1991 年初到秋天，日本在浦东的投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成立了好几家日本独资企业和与中国及其他外国企业合作的合资企业。显然，日本工商业正在上海和浦东建立他们逐步增大的势力 进入直接投资和管理领域 从而超越了单纯做商品贸易的阶段。

虽然目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日本对上海和浦东事业的兴趣在增加 经济势力在扩大 但是 要保持和扩大日本投资的范围和数量，中国方面仍要做许多努力。为了消除部分日本人对在浦东投资的疑惑，上海市市长黄菊于 1991 年 10 月初宣布 市长办公室将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解决有关外国投资的问题。这一最新的举措似乎是对以前的措施如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接待办公室的补充。此外，上海市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程序来处理海

外投资者的抱怨，并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简化施工程序，这是从前最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引起外国投资界最多不满的问题。据中国报道，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优惠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日合资企业的产生。

## 小 结

本文探讨了进入 90 年代后影响日本在上海浦东新区投资发展的几个环境因素。

概括地说 我们认为 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正处于转型期 中国对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主要推行新重商主义的政策。更明确而言 我们发现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再一次活跃了起来。

我们还认为 在经历了 80 年代初的无数次挫折后，日本工商界普遍对中国不稳定的投资环境感到担忧。1988 年中日投资保护协议的签定减轻了这些担心，使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可是，在顺利的开端以后又遇到严重挫折，1989 年 6 月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嘎然停止。总体而言，1990 年发达工业国家休斯顿高峰会议后，日本投资活动随着日本恢复对中国的贷款而开始复苏。

90 年代初，日本逐渐增加在上海的投资，这主要是上海市政府作出的非凡努力的结果，市政府决心吸引大批日本公司以提高上海的工业技术能力。实际上自 1990 年春宣布开发上海浦东新区以来，无数日本专家和经理代表团应邀访问上海考察浦东新区。接着，就成立了数家日本全资企业及与中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合作的合资企业。不过，上海能否成功地利用日本的

投资、援助和技术转让 增强浦东的工业技术能力 这还要拭目以待。

（本文编译自《9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书第 10 章）